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 (1949~2009)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49-2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 (1949~2009)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49-2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1949～2009）/张蕴岭
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ISBN 978-7-5097-1028-9

I. 中… II. 张…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1949~2009-文集 IV. 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3111 号



国防大学 2 126 6045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专辑)

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 (1949 ~ 2009)

主 编 / 张蕴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宋浩敏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398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28 - 9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转折，中国结束了内战，取得了独立，扭转了衰势，也是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新中国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生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制裁、禁运、封锁，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新中国实行了与苏联老大哥结盟的“一边倒”战略。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和限制。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的发展环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得不为新的国家安全生存而斗争，被迫实行以对抗苏联霸权主义为要旨的转向战略，先是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三个世界”理论），把联合与团结第三世界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后来，又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交友，建立反苏阵线，试图从夹缝中突围。

应该说，直到实施改革开放大战略前，我国的对外关系都主要是被动应对的，一直主要为自身的生存安全而奋争，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的一些外交理论和制定的外交战略政策，也都主要是围绕这个中心。

应对型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略与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突破外部威胁，保护国家的生存安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所有的外交思考、设计都主要是应对外部敌人怎么来侵略我们、颠覆我们。应对型对外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动的应付，首先是着眼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安危，其次才是发展问题。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被动应对环境下，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抗美援朝

朝，是为了新中国的生存；应对苏联威胁，经济后撤三线，也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在此情况下，我们有时必须作出牺牲，从而使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产生巨大的转变是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强大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也由被动应对型转变到开拓创造型。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外开放的关注点，先是主要了解、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寻求条件扩大对外关系。后来，我们逐步由吸收消化，转变到开拓创造，重点转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主动创建国际环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此提出自己新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引导国际社会向更加合理的秩序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变。

60年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的腰杆硬起来了！由站起来到腰杆硬起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现在，世界上到处都谈中国，关注中国。“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很不同的道路：一方面，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使世界更具多元特征，这与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世界从此统一到美国模式大相径庭。

中国发展变化太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适应，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更有些难以接受。西方人往往以近百年来形成的西方主导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结果，越看越不规范，越看越感到担心。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取得了那么多成就，到了一些外国人那里，许多竟是“黑”的了。外国人看到中国很多的问题，很担心，在许多人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么不同，到底怎么样，没把握。因此，他们往往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预测很悲观。因此，外国人对中国的有些“抹黑”也不完全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价值判断的不同，出于对迅速发展强大的中国的误解和担心。这也是对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强大必然会产生战略碰撞，因此也会使一些国家、一些人产生战略敌意。比如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必然担心中国的挑战，为此，在战略上就会采取对中国的限制、遏制政策。至今，尽管中美关系得到稳定发展，但是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运作、对中国的高技术禁运封锁并没有停止，不仅是美国一家，还有欧洲、日本等美国的西方盟友都这么做。同时，中国的“异质模式”成功本身也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因此，也会造成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警惕，而价值观的差异也会在其对华政策上反映出来。虽然中国是他们利益上的交往与对话伙伴，但不是他们的盟友，这一点人家清楚，我们自己也清楚。在他们许多人看来，中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太多的担心，甚至惧怕。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和历史的经验，一个崛起的强国总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总是要扩张，总是要诉诸武力。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问题。所以，对“中国现象”的争论还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创造的明显转变发生在这个新世纪。推动区域合作是这个转变的一个凸显例子。2000年，朱镕基总理在东盟提出来要与东盟建立长期的经贸关系，搞自由贸易区。这显然是一个主动型战略。改革开放后，我们先是要求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也就是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加入WTO不是创造，虽然是一种主动性参与，但是在关系构架上很被动，人家掌握着主动权。我们要求人家允许入伙，人家不会轻易放你进入，结果谈了15年，左谈右谈就是不让你进，最后我们做了巨大的让步，好不容易才进去了。2000年就不同了，我们主动提出来，得到东盟的响应，很不一样。由于处于主动，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想法与对方商量，这样就可以主动发挥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步棋把我国的外交这盘大棋搞活了。接着，日本跟进，韩国也跟进，我们走在了前头，使得东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显著进展。接着，我们还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取得了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合作的主动权，创建了新的安全与发展合作形势。

我们创造环境从推动区域合作开始，进一步延伸到国际层面，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通过20国集团会议，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旨在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我们推动构建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是要搞革命，推翻现有的旧体系，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对其进行调整、改革，实现稳定、有序的逐步过渡。这样一种稳定转变的秩序对大家都有利，我们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是通过参与现有国际体系取得发展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主张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方式来构造对外关系和安

全结构，为此，我们提出了“新安全观”。什么是“新安全观”？就是跟旧安全观不一样的安全关系和架构。旧的安全观是什么？就是军事结盟关系，是二战以后形成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包括双边同盟和地区同盟（大西洋联盟）等。我们提出的“新安全观”，核心就是共同安全、协商对话，避免使用对抗的方式、军事的方式。在与邻国的关系上，我们提出来很多新的原则，比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安邻、睦邻、富邻，等等，我们不仅说说而已，也实际努力去做。

在国际秩序方面，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思想基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也基于和平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强调“和而不同”，“和”就是和谐共存、和睦相处，是在尊重不同的前提下求得共同发展。世界是多样的，“不同”是客观存在，“和”是目标。我们提出来构建“和谐世界”，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基本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观念。

苏联解体后，剩下的就是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共产党执政。西方在推行民主的口号下，要实现“历史的终结”，这个形势很危险。我们小心地、谨慎地、主动地创造环境，提出构建“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就不同于敌对关系，寻求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不是在搞游戏，而真正是在努力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和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大国构建伙伴关系，和邻居也构建伙伴关系，而且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定位，这样我们取得了主动。现在，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方式，这是我们的创造，功不可没。二战以后的冷战时期，是两个阵营的敌对关系，两个联盟对抗，把世界推向冲突的深渊。冷战结束后，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经过努力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我们是有贡献的。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通过这样一种创造，既改善了我们的发展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人关注。我们主动提出来要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前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强大起来了，她要做什么，大家都关注，因为涉及人家的切身利益。我们提出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特别是近代）的道路。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始很多人可能不信，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让时间考验，慢慢大家会把它作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准则，至于将来能不能成为主导的关系，要看我们本身的发展。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对外开放来迅速发展自己，这一点我们应该说也做

了很多创造。开放改变了我们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困境。开始，我们没有资金，没有市场，我们通过引进来，“借船出海”，取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开放，我们把跨国公司引进来，我们有劳动力，从搞出口加工开始，进一步提升，如今成了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通过开放加快发展，应该不是我们的首创，做得好的开始是“四小龙”，但是，我们比他们做得大，许多地方我们做得更好。尽管我们在开放发展中还有不少问题，比如，导致过度的对外依赖经济结构，但是，没有大胆的对外开放，就没有如今的经济成就。在全球化时代，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加快发展自己。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发展自己，我们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为世界作出贡献。

我们的对外开放是主动参与国际体系。什么叫参与，参与就是进入内部，寻求利益。对外开放，就要学习别人，要利用别人，要和别人在一起，因此，我们是通过参与现行的体制、制度来发展自己的，这一条非常重要。美国人说我们是国际制度的一个“利益相关者”，这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尽管我们认可当前的国际体系，但它并不完美，有很多问题，许多地方我们并不满意。因此，必须要对它进行改革，使其更为合理。作为“利益相关者”，我们是与其他国家一道做，不是单枪匹马，也决不当头，而是通过参与，在发展中提出我们的主张，作出我们的承诺和努力。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规模巨大，首要的是搞好本身的发展。中国发展的成功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同时，随着我们实力的增强，我们参与改革世界体系的能力也会增强，由此，我们的贡献也会更大些。

中国60年的对外关系很值得总结，有成功，有失败，也有教训。中国正处在一个大的发展转变期，世界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变期，有机遇也有挑战。过去的60年，我们走过来实属不易，取得了成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对外交往中，我们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风格，有赢得赞誉的沉稳老练的外交亮点，也有过令人难以认同的极端盲目操作。如今，在历经磨炼之后，我们变得更自信、更成熟了。中国正在以新的面孔、新的风格和新的理念，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对今后60年中国的对外关系，我们很难预测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更主动。愿更顺利、更成功。

本专辑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组织，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过去60年的对外关系进行一些总结和思考。这里，作者不是专门写我国的对外关系史，而是从我国与主要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发展，从一些重要问题的视

角观察，对我国过去 60 年的对外关系进行一些分析总结，并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思考。我相信，这些论文能为读者了解、研究我国 60 年的对外关系发展提供一份宝贵的资料。

国际研究学部的李墨女士为本专辑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协调联络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专辑的及时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

2009 年 8 月 20 日

目 录

前 言	张蕴岭 / 001
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关系：对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	黄 平 周建明 / 001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 60 年	李东燕 / 035
中国与欧洲关系 60 年	周 弘 / 049
中国与非洲关系 60 年	贺文萍 / 067
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	郑秉文 孙洪波 岳云霞 / 086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思考	张宏明 / 114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与思考	王京烈 / 132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与思考	赵常庆 / 148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与思考	李 文 陈雅慧 / 160
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发展与思考	叶海林 / 173
从经济视角看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	裘元伦 / 185
从观念层面看中欧关系的发展	田德文 / 199
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看中国与东盟的发展	柴 瑜 沈铭辉 / 218
从未来发展视角看中拉关系的发展	苏振兴 / 234

中美关系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	周 琪 / 248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陶文钊 / 269
中俄关系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	李静杰 / 291
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邢广程 / 309
中日关系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	高 洪 / 322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张季风 / 333
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	张进山 / 347

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关系： 对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

黄 平 周建明*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不平凡的 60 年的历程。作为一个新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家安全上始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处理好国家安全问题，制定和实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认真加以回顾。

中国过去虽然没有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概念，但实践中，中国一直有清晰的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所认知和实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本文试图从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和内容角度，对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回顾与考察。

一 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经验的回顾

如果说中国人民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站起来的话，那么能够在一个极为严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得住，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靠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所实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 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制定和实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是对国家利益^①的认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稳定性；不存在大国直接威胁的周边环境；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制度的延续性；国家追求发展和繁荣、人民追求福利在外部不受强制性限制。

（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作为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始终围绕着维护上述核心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来坚持和追求，这一理论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整个外交行为。有的时候，中国在这个时期内的外交政策除了维护国家利益以外，也往往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加以坚持，并成为这个时期外交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也有演变，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边倒”的对外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前，中国明确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选择这个外交战略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中国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争取对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署。“一边倒”的战略，实质上在国家安全上中国依靠苏联，联苏抗美；在社会制度上，中国选择了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正是在采取“一边倒”战略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获得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战略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上，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事实上是中国取得外部援助的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54

^① 在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语境中，中国并没有使用国家利益的概念，以后即使使用这个概念，也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过明确的界定。但是，它并不表明当时的中国领导集体不懂得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可能比任何其他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具有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

年苏联为中国援建的 156 个工业企业、提供的 5.2 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苏联还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留学生。苏联的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防力量的迅速加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达到了中国当时的战略目标：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建设。

应当指出，即使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下，中国政府也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只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关系，更不接受苏联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而是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如：“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倾向”，等等），确立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还应当指出，即使是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下，中国不仅没有简单把自己纳入苏联阵营，而且还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以此来追求与周边国家和二战后纷纷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按照这五项原则，中国先后与印度、缅甸改善了关系，并且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与各国代表共同缔造了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友好合作的“万隆精神”，之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分化了美国所企图建立的反华包围圈，大大减轻了中国在安全上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①

“一边倒”战略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与争取工作。中国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看做铁板一块，而是将其分为“和平中立派”、“维持现状派”和“主战派”三种类型：团结新独立和正在进行

①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 214 页。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支持伊拉克革命和反对美国入侵巴嫩；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承担了非常重的义务。比如，1956 年为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向埃及提供了 2000 万瑞士法郎的无偿援助；为策应黎巴嫩人民的反美斗争，在 1958 年发动了金门炮战，其中一个目的是把美帝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为支持阿拉伯人民扩张主义的斗争，拒绝与以色列建交；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宁愿推迟与法国的建交。（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 216 ~ 219 页。）

独立斗争的民族主义国家、西北欧具有中立倾向的“和平中立派”；争取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孤立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对待美国，一方面坚决反对它的侵略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也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的争端。^①对于日本，中国领导人也认为应谋求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以促进日本独立倾向的发展，削弱美日联盟。^②

“一边倒”战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界定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它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干预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实行“一边倒”战略，以及与其他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就是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对象的。为此，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直接进行了一场战争。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为反对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以及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中美之间一直持续着尖锐的斗争。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外交上中国对美国仍然保持着弹性，以争取减轻安全上的压力和扩大发展的空间。1955年，周恩来总理主动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③促成了1955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的会谈。

总的来看，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种自主选择，主要是依靠苏联来抗击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或依附于苏联，而是以我为主，对苏联有依靠，有联合，也有斗争；在反美的问题上，也是以我为主，力图建立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由此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有效地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与苏联无论在国家利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冲突。苏联从试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追求与美国的缓和，到后来直接威胁中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面对来自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毛泽东对国际格局做了新的判断，认为

①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116页。

②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248页。

③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158页。

美苏两国既强又弱，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行不通，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并日益发展成为与美苏相抗衡的独立的力量，这为中国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①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既反美又反苏，两条线作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威胁。

在“反帝反修”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发展和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广交了一大批“穷朋友”，与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上相互支持，最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1 年重返联合国打下了基础。

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既包含从中国自身安全出发的考虑，也包含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正义斗争支持的内容。在这个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加了中国的安全上抗衡霸权的能力和筹码，这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在国际外交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国政府在自己的经济力量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承诺了对外经济援助。周恩来总理在 1964 年 1 月访问马里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实际上是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外交目的的一种方式，它服务于外交战略。

按照“反帝反霸”的战略，毛泽东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看做“中间地带”，以后在“三个世界”理论中被称之为“第二世界”，包括欧洲、北美洲、大洋洲诸国和日本，其中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四个国家。这个认识，在实行“一边倒”战略时就已形成，在“反帝反霸”战略中又进一步深化。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把西欧看做一支抗衡美、苏的政治力量，支持西欧的联合自强，其战略意图是促使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联合中国与日本，构成反对霸权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加强和发展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 1964 年与法国的建交，打破了“冷战”对中国造成的藩篱。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采取收缩政策，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减小。中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

^①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第 8 页。